

新辩证论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

黄 晖

(苏州大学 中文系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 要 :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本质不在于同一性而在于其差异性 ,但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 ,即差异是同一的具体形态而同一是差异的理想形态。这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新辩证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必须首先承认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 ,然后才能通过这种关系进行文化对话。而对话不是万能的 ,必要的文化逾越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差异与同一是一体的 ,文化对话与文化逾越也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新辩证论 ;同一性 ;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509X(2003)01 - 0054 - 04

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世纪与千年 ,文化多元论与文化一体论的观念交锋已趋向理性反思阶段 ,比较文学这一居于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地位的学科也进入了一个学科理论创新时期。回顾百年比较文学发展史 ,从基亚等法国学者把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文学的发展史” ,到雷马克定义中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再到当下蔚为显学的“跨文化比较” ,其间比较文学所经历的绝不仅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 ,这一系列转向表征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断深化和学科理论的再建构。

一、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焦虑

在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库恩看来 ,“范式”(paradigm)是在特定的时期内 ,由重大科学成就造成的“科学共同体”所制定的理论、定律、准则和方法的统一体。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发生期的影响研究到发展期的平行研究 ,再到成熟期的跨文化研究乃至阐发研究的范式转换。而对于不同的研究范式而言 ,“比较”一词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意义的。影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 ,旨在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 ,它曾以无可辩驳的实绩证明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 ,影响研究“由于过分拘泥于实证的方法 ,过分强调事实联系而相对忽视了作品内在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因此使比较文学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附庸 ,自身的学科身份和位置面临着丧失的危险”^①。其原因在于 ,首先 ,比较文学研究仍然是一种文学研究 ,而“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 ,而是价值和质量”^②。“价值和质量”即文学性 ,这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 ,它规定着学科的性质和类属。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事实联系仅仅是研究的一种手段 ,而非终极旨归。其次 ,这种研究范式常常把文

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文化体系之内 ,或以此作为考量其它文化体系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落入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窠臼 ,因此有悖于比较文学不断超越文化界限 ,不断吸取新质的学术品格。最后 ,若从历史实证的维度审视这种文学间的交流和影响 ,它们在更多的情况下体现为一种文化氛围 ,很难找到确凿的材料以资证明。严羽论诗曾有“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的妙喻 ,这也适用于描述文学影响的实际情况。但我们又不能因为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而断然否定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这里仅以陈寅恪、宗白华、钱钟书为例 ,他们皆游学欧美数年 ,精通多国语言 ,但是其学术著作中极少“洋味” ,这就说明了他们治学已臻东西交融、善出善入的化境。

平行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虽不存在事实联系 ,然而在内容、形式或创作方法上具有类似特征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它克服了影响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和某些偏颇之处 ,曾一度为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但是 ,由于没有事实联系作为限制条件 ,平行研究中跨越时空的纯粹比较 ,可能并且容易导致诸如简单的比附 ,零碎的拼凑 ,肤浅的异同排列等弊病 ,以致把比较文学引上非文学研究的歧途。这就提醒我们 ,从事平行研究 ,如果仅停留在表面的比附层面 ,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因为比较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 ,“如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现象 ,则应取得两方面的成果 :通过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现象的阐释而对一些文学史的老问题提出全新的观点 ,另一方面则透过对中国文学的微观分析而达到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乃至重构”^③。与此相对应 ,我们也可以运用中国文学理论去研究西方文学 ,这才是高层次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应达到的成果。早期的一些文章如胡经之的《比较文艺学漫说》、张隆溪的《应当开展比较诗学研究》等 ,对此作了一

* 收稿日期 :2002 - 04 - 24
作者简介 :黄 晖(1971 -) ,男 ,江苏丰县人 ,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十五规划项目(01EZW001)
· 54 · 万方数据

般性的阐述。后来的研究专著,包括一些比较文学教材,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讨论、介绍,如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饶芃子等著的《比较文艺学》等。然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地告诉我们,在方法论基点上,平行研究一直遭遇着是否具有“可比性”的尴尬。维斯坦因就曾经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表示怀疑,他说:“我并不否认艾金伯勒(Etiemble)所呼吁的,诗、征象、图像、风格等的比较研究自有其意义,但对两种不同文化现象的平行研究,我却深感犹豫。因为依我看来,大家在有意或无意间支撑的传统中的共同元素,只有在同一种文化中才能找到”^{[4] (p.77)}。在我们看来,这种人为比较文学研究只能在同一文明体系内部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其“犹豫”并非没有任何学理上的意义。

阐发研究是晚近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并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主要方法。它常见的研究范式是用一种文学理论去解析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文学理论的相互阐释。一开始就有论者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果采取一些大而无当的方式,不从具体的观点、见解出发,阐发研究就会失去说服力,因此,它最忌讳那种空空洞洞、言之无物的理论说教”^{[5] (p.153)}。事实上,大量的个案研究的确如此。常见的做法是,把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不加分析地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例如,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诗歌和小说,从中分解出符合结构主义的图式。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只是得出了一些毫不相干的结论,其“危险性”在于牺牲中国文学与众不同的(常常是难以驾驭的)特色而过分相信西方理论的普遍适用性^{[6] (p.75)}。

依我们的理解,比较文学理应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发挥主导作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参照系。比较文学应以全球多元文化意识为理论根据,强调各民族文学相互平等的地位、权力和价值。它应当把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看作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地加以比较阐发,探讨人类文学发生、发展、交流、碰撞、整合的过程和规律,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以民族文学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宗旨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这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遗憾的是,当下指导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是西方中心论范式,将求同或者求异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向认识和阐释的极限。文化的多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型,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某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型。

二、多元文化语境与新辩证论

就研究范式而言,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首先潜在地假定了本国文学的合理性与优越地位,在比较研究中更侧重于本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影响,或者以本国文学为参照系,力求在此基础上揭示他国文学的局限和不足之处。这种研究的主旨在于比较相同和差异中,彰显本国文学的优势地位。对上述研究范式的质疑,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另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多元文化的理论视域,并使之适合于有效地阐释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情境。换句话说,多元文化理论作为一种语境(context),如何

创造性地运用到比较文学问题情境中,进而揭示中西文学文化发生发展的普适规律。

新辩证论的出现无疑是多元文化理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折光。作为这一研究范式的首倡者,方汉文教授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推进……人们不再满足于古代人对文化差异的初级认识形态……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关系不能再只以自我感觉为基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有逻辑基础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应从科学角度说明文化差异与同一的实质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对待”^[7]。这一论断充分表明,新辩证论截然不同于前此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它一开始就反思和质疑传统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希望初步确立一个建构于辩证逻辑基础之上的新的文化认识论,并始终注目于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情境。

从学理角度说,所谓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情境应包括两个基本层面: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首先,问题意识指研究主体的某种深刻而有自觉的多元文化意识。缺乏这种意识,研究就容易落入“西方中心论”所预设的种种思路和指向的窠臼,进而忽视了中国文学自身问题的差异和特殊性,满足于以西方标准考量中国文学,最终导致遮蔽中国文学特性而虚假地证明了西方标准的普遍有效性。有鉴于此,新辩证论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对于研究主体的视域限定,并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主体必须以“超越主体自限为目标,这中自限主要是指本民族文化的限定性。这就是说要求主体用自己他人的两种视角来协调认识。”^[8]

这里的“协调认识”就是指研究主体如何调整自己的话语立场才能适合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其关键在于,在“他者”面前如何正确认识“自我”,又如何正确认识“他者”。在我们看来,在中西比较文学领域里,中国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避免西方中心主义者以自我的身份对中华文化他者的虚构,拒绝以他者的声音为他者说话。其次,问题结构是指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属性和结构,也就是指它有别于其他文学研究范式的某种内在的逻辑性和独特性。它不是表层的结构特征(同与异),而是深层的结构关系(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新辩证论的理论旨归不是说明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存在,而是研究如何使两者达到辩证的结合。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辩证的结合,表现为同一与差异的协调,协调不是静止,而是彼此化生,也就是文化之间同化与异化的辩证法发展过程。对于不同的文化形态,首先必须强调不同民族间的差异,这就如同事物总有阴阳对立一样,它们没有绝对的统一,一不能生,阴阳两仪才是变化之本。同时,它更看重差异对立中的相互联系,阴阳合于一,这才是统一性。可以说,这是一种整体的辩证观念。

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本质不在于同一性而在于其差异性,但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正如墨经所说中“同异俱于一”,即差异是同一的具体形态而同一是差异的理想形态。这就是东西方对话的理论基础——新辩证论。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时代的东西方关系必须首先承认差异与同一的辩证关系,然后才能通过这种关系进行文化对话。而对话不是万能的。必要的文化逾越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差异与同一是一体的,文化对话与文化逾越(transgression)也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新辩证论所强调的“逾越”是指对差异与同一的扬弃,经过这一过程达到新的合一。东西方的

逾越是正常的,通过逾越才可能有文化的进步,文化进步观念是应当肯定的。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而不是相反。

三、对话与逾越 新辩证论的学科理论建构

新辩证论之所以初步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如何理解差异与同一的关系这一难题,是因为它较为科学地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型,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念中获得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和理性原则为逻辑基础,提出了研究问题的新的思维路向。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所以比旧理论“科学”,必须同时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其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其二,能够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其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新辩证论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首先,新辩证论仍坚持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是以比较而起家,舍此别无他途得以自立于学术之林。比较文学的“比较”并不仅仅指一种学科方法,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示一种辩证思维范式和理论语境。也就是说,它并不执着于而是努力超越形式上的异同之比,在交流和对话中达成理解,并朝着视域融合甚至文化融合的方向发展,最起码也要对双方都有所补益。比较不是目的,比较中达成的“互照互对互比互识”才是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透过主体视界比照中西文学,洞悉各自的特质,阐释双方的异同之处,并进而能够认识到各自的优长与不足,然后以双方的“合力”逐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质言之,我们所理解的“比较”应以兼容并包为前提,双向阐发为途径,话语重建为旨归。

其次,新辩证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此研究范式所遭遇的难题。如前所述,比较文学的名称“比较”在此理论视域内并不单一指涉比较方法,其根本意义是指“对于差异性和同一性作辩证的理解,所以可以说比较文学的比较是辩证的比较而不是形式的比较,这是比较文学不同于其他学科中所使用的比较方法的根本原因。”^[9]对于“辩证的比较”,又可以分以下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中西文化在对立差异中有新的同一性,差异中有相通(而非相同)之处。这是针对前此研究范式中的“过分求异”倾向而言的。《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对于理解东西方文化和文学有着深刻的意义。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他者眼光,旅美学者张隆溪先生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就寻求异中之同采用了“文化求同”的理论策略,其锋芒直指西方中心论的“东西文化二项对立”的偏见。“东西文化二项对立”是西方学术界以一贯之的理论路线,其实质在于它过分强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将确实存在的文化差异推向极端,是不同文化成为互相排斥的二项对立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然后再拿中国来作西方的非我陪衬,西方文明所具有的更高价值于是便凸现出来。为了避免“文化差异(对立)”的他者化战略,张隆溪先生不断反努力拒绝简单的二项对立化判断,注目于言义关系这一理论基点,寻绎出中西解释学的视界融合点,从而揭示出中西文化共同存在着“逻各斯中”^[10]。万方数据

心主义(logocentrism);方汉文先生则通过诗言志与模仿说、德言说与神赐灵感说的比较研究,得出中西文化共同存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结论。这些在文化的对立与差异中看到新的同一性的研究,无疑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丰厚创获。

第二,诚然,我们不愿意看到全球化/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但是如何才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以达到双方的对话和互补?我们认为,当下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本土化的研究,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照模式,这就导致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建构,只能取其一而不能取其二。其实,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局限,使得实际上精彩而又全面的分析,在形成结论时,难免偏至。如果我们超越二元对立,更多地注意到二元对立中的张力关系,那么研究范式的建构,就能形成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这应成为我们研究文学文化关系的新的出发点。

第三,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和文化是互有差异的非同一性,其差异具体表现为民族性、地域性和种族性的不同,由此形成多种文化形态的共存与差异。同时,人类又有基本相同的存在环境与生存方式,因此人类文学与文化又具有同一性。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正是差异的存在才有互相作用的可能,通过相互的同化与异化,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互异与同一的联系才是辩证关系的核心,而承认差异性则是认识辩证关系的关键,不是以同一性为辩证的唯一中心。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第四,新辩证论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让人们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文学的内在价值和独创性。以对于文学有重要意义的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为例,记载古希腊民族征战历史的荷马史诗成为民族文学的中心,战争的酷烈使人深思生命的局限与命运的悲哀,主体意识向往于对于生命意义的超越。相反,殷商两千年间,中原文化发达,人民安居乐业,《诗经》以天人合一、人伦教化的表达为主,讴歌人生的情趣,成为主体精神自由最完美的表达形式之一。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学艺术,各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就是人类审美情感的差异。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才是真正的比较。

最后,新辩证论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具有新的预测力和阐释力。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范式,来深刻而又准确地把握当下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新辩证论正堪当此任。因为,它一方面指明了世界文化的多极性之源正在于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预见到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源于中西文化的宏观整合。我们只有在承认对方差异性的基础上,才能在辩证的比较中建立统一性关联。必须以承认差异性的存在为前提,不能只确定一个中心或参照系,而应该是互为参照,从观念形态上彻底排除“西方中心论”,从而建立一种良性的对话关系,在对话中阐释。一方面尊重阐释对象(客体),另一方面也要从对象中获取让阐释者本身增值的东西。但必须警醒的是,我们不能甘当中国古人或西方他者的替身,代他们发言。也就是说,不能以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为出发点,以他们的理论归宿为归宿,基点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确立,形成真正的阐释主体。新辩证观念的多元主体观认为,从他人文化的眼光来观察并不是对自我的

削弱,并不是“代他们发言”。相反,只有从他人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而只有理解他人之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因为自己与他人是共存的。

综上所述,在新辩证论的理论视域内,比较文学学科绝然不同于采用比较文学观点与方法的其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因为它运用了比较方法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特定的理论立场。比较文学作为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的研究方法超越了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多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比较文学在发展中不断超越比较方法的事实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一言以蔽之,比较文学在本体论意义上指的是多元文化语境下异质文学研究的透视与对话。“比较”成为许多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但这并不能取代比较文学,而是更加确立了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在当下与未来学术界日趋国际化景观下的主流地位。

参考文献：

[1] 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美]雷纳·韦勒克.批评的概念[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3] 王宁.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Ulrich weisst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M].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5]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 孙筑瑾.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视角问题[A].李达三、罗钢.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 方汉文.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N].光明日报,2000-5-30(3).
[8][9] 方汉文.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J].中国比较文学,1999(2):1-16.
[10] 方汉文.多元文化的新辩证观念[J].外国文学评论,2000(3):137-145.
[11] 方汉文.新辩证观念:中国比较文学与多元文化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0(6):155-165.
[12]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New Dialecticism :a Paradigm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Pluralistic Cultures

HUANG 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Suzhou University , Jiangsu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common nature of East-West cultures does not consist in its identity but consists in its difference ,but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is not absolute. That 's to say , difference is the particular formation of identity , but identity is the ideal formation of difference. This is the theory found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new dialecticism. We must admi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first , and then carry out the cultural dialogue. Dialogue is not omnipotent. The cultural transgression is necessary.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d the cultural transgression is in a unity .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 new dialecticism ; identity ; difference

四、结语

新辩证论适时应运而生,其理论意义在于“逾越文化一体论与文化相对论之间的壁垒,使得世界各民族文学和理论,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存与相互转化,为它们之间的融合与选择、继承与扬弃、濯旧与换新创造条件”^[10]。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辩证论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方向之一。它将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于学科的定义、性质和特征、研究对象和主体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在不同文学研究实践中所必然产生的变革,这种创造对于现代学科的建构是完全正常的,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有对于基本理论的不断建构”^[11]。中国古代学者刘勰曾经把这种现象总结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12] (p.258)}。